

在广州、黄埔听中山先生训示

刘 羲①

一九二四年初，我正在江西省第五师范教书。一天，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易毅跑来告诉我说：“孙中山先生正在广东倡导革命，他主张国共合作，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创办了黄埔军官学校，我们一块去投考吧。”我在少年读私馆时就崇拜中山先生，而从军是多年的愿望，我曾由江西都督欧阳武介绍报考过保定军校，但几次都没有报上。易毅的这一想法正合我意。

于是，我们瞒过了学校，备了点简单的行李盘缠就上路了。先乘车到九江，再乘船经上海、香港辗转到了广州。到了广州以后，我们无处安身，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家江西人开办的吉州会馆，因我们是江西老乡，也就住了下来。这儿有饭吃，房租也便宜。正巧，黄埔军校的教官刘峙（江西吉安人）也住在会馆，他每天乘小火轮往返会馆与黄埔军校。刘峙问了我们的情况，我们说原来在家乡教书，现来报考黄埔军校。刘说：“你们在学校收入如何？”我说：“每月有六七十元。”他感到很奇怪，说这样的收入已不错了，为什么还要来考军校。我答：“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从军，别无其他目的。”刘峙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过一些时候回家乡去。”但我们执意要考，他拗不过，又问：“你们是国民党员还是共产党员？”

① 刘羲现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现年九十一岁。

我说都不是。他说，这不要紧。说着马上就拿出几张国民党党证让我们填写，还作了我们的介绍人，并说，明天就去考吧，但考上考不上就看你们自己了。我不服气地说：“保定军校的四大教程我早就看过。”刘峙说：“那是书上的东西，没拿过枪，没操练打过仗，还是不行的。”

第二天，我和易毅到黄埔参加了考试，很快就被录取。易毅被分到步兵团，我编入黄埔二期的工兵团。该队有一百二十多人，队长是严重（保定军校毕业），到毕业时换了李卓元（日本士官生），还有几位俄国和日本教官。我们工兵团多是有文化的，因课目相对来说比较深奥一点。课堂上主要讲土木爆破、架桥等等，上一段时间课，就去实地演习，爆破钢铁、水泥、土方等各种不同的实物。如果什么地方发生战斗，马上就拉出去作预备队，回来再继续上课。我记得，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曾几次到工兵团为我们讲“社会主义经济”课。当时，我们队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都有，王若飞、方天、邱清泉等都在工兵团，大家常在一起研究辩论各种问题。党代表廖仲恺也常和我们在一起聊天，他说话很风趣生动。有一次他说，蚂蚁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看来是没有数字的，很乱，而它们却很有数，而且很有秩序，很团结；蜜蜂也很团结，有蜂王，下面分工也有不同。他就用这样的事例来启发我们要团结守纪律。汪精卫从不同我们学生聊天，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总是一副政治家的模样；邓演达说话也不多，我们觉得他很严肃，有点威风凛凛的；周恩来则是一种文人学者风度。

在校期间，我们曾多次聆听孙中山先生的训话。大约是一九二四年的春夏之交，学校接到电话通知说，孙中山要到黄埔军校视察。在他到来之前，我们步炮辎工等队学员早早就全副武装集合在操场上进行分列式排列。中山先生身着短装，头戴博士帽，在

宋庆龄的陪同下来到了大操场，我们都举起步枪行注目礼。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话的大意是，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要努力革命，中国不革命是没有出路的。但革命没有武力不行，过去我们的武力靠不住，老是被人牵着走，即使有一点也不能进行统一的训练。今天，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武装，现在，把你们召集起来，就是要进行统一的训练，使我们的武装更加有力。中山先生讲话时，宋庆龄夫人拿着本子和笔在一刻不停地记录着。我们黄埔的学生对中山先生一向都是崇拜备至的，中山先生的讲话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

以后，中山先生又几次来校训话，我们都感到很受启发，都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九二四年十月，广州商团发动叛乱，我们黄埔学生军奉中山先生的命令开往广州增援，教导一、二团为前锋，接着是步兵队、工兵团等。一天上午，我们乘小筏子驶离黄埔，我们工兵团的武器配备除每人一支步枪外，还带有炸药、架桥爆破等器材。黄埔军校的教导团首先与敌人接上了火，我们作为预备队。上级长官说，前面的军队不可靠，你们这次去不一定要参加战斗，主要是壮声势，提高士气，待前方不济时，再顶上去。因此，我们工兵团没能与叛军直接交火，但大家的士气旺盛。几天后，叛乱平息，我们又撤回学校上课。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中山先生即将北上。一天，我们接到命令，在当日赶到广州，听中山先生的演说。同学们一船一船全部上了岸，前往中山大学。会场设在大礼堂，一千多人把全场挤得满满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只见中山先生到了会场，健步走上讲台，他习惯地先把挂表掏出来看看，然后放在桌子上。他操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声音很宏亮。讲话时没有稿子，手势也不多，

是即席演说。中山先生主要讲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我清楚地记得，他在谈到民生主义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叫农民有田种，有饭吃，要提高他们的营养水平。但不一定要到外国去进口补品，要靠我们国内自己的东西。我们的农村中到处都养了猪，豆腐也好做，用猪血煮豆腐顶补人。我们知道中山先生曾经学过医，他对营养方面是很在行的，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能依赖人家。会议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不几天，中山先生就启程北上了。

中山先生北上后，我们在南方一直惦念着他，每次无线电广播，我们都注意收听有关中山先生的消息。一九二五年三月，黄埔学生军奉命随东征军开往东江淡水一带讨伐陈炯明。当时，我们工兵团在淡水河婆一线的丘陵地带进入阵地，占领有利地形，每个人都在各自的战壕里待命。我军对面之敌是林虎、洪兆麟部的叛军。三月十二日这一天，友军早已与叛军接上了火，枪炮声响成一片，我们的阵地还处于沉寂状态。就在这一天，无线电广播中传来了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消息。长官得知这一消息后，把各班长召集作了传达。不多时，这一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阵地。大家都是中山先生的学生，得知了这一消息，心里都十分难过。但士气却更加高涨，大家都想快点打，早点打垮叛军，完成中山先生生前的遗愿。这时，叛军又发起攻击，我们阵地前方和两侧，喊杀声、枪炮声震耳欲聋，叛军的一次次攻势很快就被我们打了下去。之后，我们在清理战场时，看到阵地前散落着不少大洋，后才得知，在每次冲锋前，叛军靠给士兵发大洋以鼓励士气。在我们撤回学校不久，广东革命政府就遵照中山先生生前的遗愿，开始了北伐。

（根据作者口述整理）